

明初佛乐与相关佛教政策 以及信仰倾向的关系

——以《献佛乐章》等佛乐为例

周 齐

佛乐是佛教传播中的生动内容，但佛教发明地印度的佛乐并未随佛教传入中国，即所谓“金言有译，梵响无授。”因而，中国佛乐也就特别能体现佛教在中国发展的一些特点。其中，佛教政策及信仰倾向与佛乐的相互关系，便是比较有探讨意义的一个方面。而明初佛教政策及流行佛乐都是比较有典型特点的事例。本文即梳理了明初佛乐创作及其与佛教政策和时代信仰倾向的背景关系，并对明初相关礼乐的认识及佛乐的时代性等问题进行了尝试性探讨。

关键词：明初佛乐 佛教政策 信仰倾向

作者 周齐，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佛乐，是佛教流行中不可或缺且特别生动的内容。与如今佛门流行佛乐有比较密切渊源的，主要还是明清以来传承的佛乐，佛门唱念所依据的明清以来的谱本等的历史痕迹，即大致说明如此。虽然佛乐谱本少有入藏，但佛乐不仅是佛经中频繁出现的词汇，藏经中还有一些佛乐及歌曲演乐的记录，透露着佛乐流行与佛教发展关系的时代特点。明初洪武时期著名的《献佛乐章》及永乐时期的佛菩萨歌曲，就是其中比较有特点的佛乐、佛教发展趋势乃至佛教政策倾向密切相关的例子。

一、《献佛乐章》及其撰著背景

明代建立在元末近二十年的群雄连绵征战之后，国土涂荡，生灵涂炭。佛教亦遭重创 “江淮南北所谓名蓝望刹，多化为煨烬之区，狐兔之迹交道，过其下者无不为之太息。”^①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虽然以极权高压手段强猛治国，但同时也实行了很多修养生息、安定四方的怀柔政策。在体国安邦的逐项举措中，利用佛教善化民心，就是明初佛教政策的重要倾向。其中，蒋山（今南京钟山或紫金山）广荐法会，则是明初君臣利用佛教的一次隆重事件，因为这次法会由皇帝和朝廷举办，不仅于明代当世颇具影响，也是为其后代常常提及而记录史册的佛教法会。

《献佛乐章》就是专为这次“广荐佛会”创作的佛乐，由明初高僧全室宗泐奉敕撰著。宗泐是元末明初著名的临济宗僧，为明太祖所推重，出任僧官，和诗赐膳，被称泐翁。奉敕撰《献佛乐章》，参与蒋山法会，只是其受帝王器重的差事之一。由于明太祖丕建广荐法会，既有明初

^①（明）宋濂《句容奉圣寺兴造碑铭》，《宋文宪公全集》卷九，《四部备要》集部，中华书局。

社会信仰倾向的背景因由，还体现着明朝统治阶层对待佛教的认识及政策原则，因而，像《献佛乐章》这样的法会佛乐的撰著及其影响等，就有了值得翻看的内容和意义。

相关事由的经过是：洪武五年正月，明太祖诏徵江南德高望重的高僧十位，于蒋山大建追荐法会，为元季因战乱而死难的亿万生灵追荐亡魂。这个法会规格高、规模大，隆重之况可由明初著名文臣宋濂所撰《蒋山广荐佛会记》略窥一斑。此记曰“太祖即位之四年，海宇无虞……重念元季兵兴，六合雄争，有生之类不得正命而终者，动亿万计。灵氛纠蟠……莹然无依。天阴雨湿之夜，其声或啾啾有闻。……洗涤阴郁，升涉阳明，惟大雄氏之教为然。乃于冬十二月，诏征江南有道浮屠十人诣南京，就蒋山太平兴国禅寺，丕建广荐法会。上宿斋室，却荤肉弗御者一月。复勅中书……移书于城社之神，具宣上意，俾神达诸冥期以毕集。五年壬子春正月十三日昧爽，上服皮弁服，临奉天殿，启御撰章疏，授礼部尚书……捧出午门，……导至蒋山。僧伽千人持香华出迎……十五日将晏，……上殿面大雄氏，北向立自迎佛。以至望燎。无不极其诚敬。乐凡八奏。首曰善世曲、二曰昭信曲、三曰延慈曲、四曰法喜曲、五曰禅悦曲、六曰漏应曲、七曰妙济曲、八曰善成曲。……还宫时，随有佛光五道，从东北贯月烛天，良久乃没。”^①

其中，“乐凡八奏”的“善世曲”、“昭信曲”、“延慈曲”等八章之乐，便是《献佛乐章》。

之前，宗泐将所撰乐章呈进，由明太祖御署每章之曲名。不仅如此，值得注意的是，明太祖还特敕，由“太常谐协歌舞之节用之，著为定制。”^②也就是说，《献佛乐章》成为明初礼仪礼乐的定制曲目。

事实上，此前太常冷谦等亦奉敕制宴乐《九奏乐章》，^③因为明太祖朱元璋厌恶前朝宴乐多阿谀之词及鄙陋不雅，遂命制作新曲以取代之。明初国祚大定，郊庙乐章亦重新裁定，也是新朝鼎革的常有内容。只是，佛乐成礼乐定制则是明初的一个礼乐演乐特点。虽然，被敕定为定制后，《献佛乐章》实际演用的情况并无从了解，但是，由永乐时期颁行诸如《诸佛世尊菩萨尊者名称歌曲》等等礼赞佛菩萨乐曲的情况，或许可大致旁证和反映，明初比较推重赞佛乐曲，并且，深入了解还可见明初流行佛乐与佛教政策及佛教信仰倾向特点等也有些关系。

二、《诸佛世尊菩萨尊者名称歌曲》的推出及内容特点

1. 御制佛曲的颁行

明代由帝王敕令制作和推出的佛乐歌曲，还有明成祖朱棣御制的《诸佛世尊菩萨尊者名称歌曲》等。永乐十七年，与颁行“为善阴鹭”、“孝顺事实”二书于文武大臣及天下学校相应，是隆重颁赐了《诸佛世尊菩萨尊者名称歌曲》，最终成曲是五十卷之多的皇皇巨著。有称“秋，御制佛曲成，并刊佛经以传。九月十二日钦颁佛曲。至大报恩寺，当日夜本寺塔见舍利光如宝珠。十三日，现五色毫光。……续颁佛经、佛曲至淮安……现五色圆光，彩云满天。云中现菩萨罗汉……。续又命尚书吕震、都御史王彰，赍捧《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往陕西、河南，……屡现卿云圆光宝塔之祥。文武群臣上表称贺，上甚嘉悦。中官因是益重佛僧，建立梵刹以祈福者，遍两京城内外云。”^④可见，此《诸佛世尊菩萨尊者名称歌曲》颁行也是如《献佛乐章》演奏后的景况类似，必有佛光祥瑞呈现。只是佛光之下现实之中，明成祖也是施政强猛

①（明）宋濂《蒋山广荐佛会记》，《文宪集》卷四，《四库全书》集部。

②（明）宋濂《护法录》卷五，《嘉兴藏》第21册。

③冷谦，精音律等。元末以黄冠隐居吴山顶。国初召为太常协律郎，郊庙乐章多所裁定。九奏乐章：一本大初，二仰大明，三民初生，四品物亨，五御六龙，六泰阶平，七君德成，八圣道成，九乐清宁。

④（明）幻轮《释鉴稽古略续集》，《大正藏》第49册。

多行苛法的帝王，但也间或相济以宽柔手法，大概礼赞佛菩萨也是其认为可以显示宽善的一种方式。延展看，这些也相应于明初社会的佛教信仰倾向。

2. 信仰倾向的影响

明成祖由“靖难之役”的数年血雨腥风而夺得皇位，其好释道的个中因由，历来备受猜测。无论是否乃其心中恐惧不安所致，但其特好祥瑞，嘉悦臣下进表贺赞祥瑞，并因之而乐于制作佛曲等，史料则确实多有记录。比如，“永乐四年，征天下道士至京师，即朝天宫、神乐观、洞神宫，修举金录斋法荐皇考皇妣。车驾幸斋坛，七日而毕。迎西僧尚师哈立麻至京师。”永乐五年，“二月，命西僧尚师哈立麻于灵谷寺启建法坛，荐祀皇考皇妣。尚师率天下僧伽，举扬普度大斋科，十有四日。卿云天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青鸾白鹤连日毕集。一夕桧柏生金色花，遍于都城。金仙罗汉，变现云表。白象青狮，庄严妙相。天灯导引，旛盖旋遶。亦既来下。又闻，梵呗空乐自天而降。群臣上表称贺。学士胡广等献圣孝瑞应歌颂。自是之后，上潜心释典作为佛曲，使宫中歌舞之。”^① 其中的西僧哈立麻，即明成祖敕封的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大宝法王。明成祖因闻其为“异僧”而迎其入京。

可见，明成祖之潜心佛曲，与其好释道、信神异、喜祥瑞有相关的意趣，而且，还与其徐皇后的信仰倾向的影响大有关系。徐皇后谥号仁孝皇后，史料中有仁孝皇后梦感佛说的故事，且于永乐元年正月初八出《大明仁孝皇后梦感佛说第一希有大功德经》。由明史而见，仁孝皇后由梦而得佛说以及特别提倡此经的背景，也与“靖难之役”密切相关。在这场叔侄争夺皇位的战乱中，其先为燕王妃、继而正宫皇后，既要维护己方利益，又要努力寻求消弭战乱罪孽的方式。此经序描述，其于梦中由观音菩萨导引而知，“今将遇大难，特为接引以脱尘劳。如来说第一希有大功德经，为诸经之冠，可以消弭众灾。诵持一年精意不懈，可得须陀洹果果……五年成菩萨道，六年得成佛果。……后妃将为天下母，福器深厚觉性圆明，妙堪付嘱，以拔济生灵。乃以净瓶甘露水起灌吾顶，但觉心身清凉万虑俱寂，忆念明了无所遗忘。遂出经一卷，令吾随口诵之，即第一希有大功德经也。吾诵一遍大义粗通，诵二遍了悟，三遍记忆无遗。观世音言，后十年更相会对。吾犹若有所言。吾耸耳而听。忽闻宫中人声遽焉，警寤。且喜且异。悚然叹曰，此梦何其神耶。亟取笔札书所授经呪。不遗一字。但觉口有异香。合中香气縕縕七日不散。天雨空华三日乃止。由是日夜持诵是经不辍。”^② 此序特别强调了持诵此经应验不爽的事实“三十二年秋难果作，皇上提兵御侮于外，城中数受危困，吾持诵是经益力恬无怖畏。天地眷佑神明协相……三十五年平定祸难。……宗社抚临大统。吾正位中宫。”“《佛说第一希有大功德经》，一字一句皆具实理，奥义微妙不可思议。”“姑述为序翼赞流通。以示妙道于无穷焉。”^③

由此可见，“靖难之役”过程惨烈及结果不可控的巨大焦虑，使得对于宗教神异奇迹的信仰成为克服恐惧及支撑信心的心理依傍和安慰乃至获胜后为夺位正名及平抑社会舆论的一种“神授”证明，同时，也与元明时期宗教神秘信仰氛围相一致，社会与统治阶层两个权重方的交互影响，使得永乐时期帝王佛教信仰中崇尚神秘的倾向比较浓重。

3. 曲牌丰富的特点

明初帝王重视法事及善用神鬼事，注重神道设教。永乐五年仁孝皇后崩，而永乐皇帝的喜好祥瑞潜心佛曲的宗教倾向则愈发深入，御制《诸佛世尊菩萨尊者名称歌曲》便是其例。

此歌曲是五十卷之多的长卷曲集，其中所用曲牌名目之多，更是不胜枚举。在此仅选录开始几卷的部分曲名曲牌目录，亦可略见明初曲牌之丰富：

①（明）幻轮《释鉴稽古略续集》，《大正藏》第49册。

②③《大明仁孝皇后梦感佛说第一希有大功德经》，《卍续藏》第1册。

卷一:

序(二篇)发四无量心——发愿

佛名称歌曲——华严海会之曲(四十二首)

卷二:

金字经之曲(三十八首) 证圆融之曲(即清江引二十九首)

广善世之曲(即水仙子五十一首) 仰鸿慈之曲(即满堂春十首)

弘法门之曲(即普天乐二十一首)

卷三:

成方便之曲(即牡丹春十二首) 转法轮之曲(即善知识十首)

布法云之曲(即醉太平十首) 胜妙明之曲(即雁儿落二十四首)

具庄严之曲(即得胜令二十四首) 胜妙明具庄严之曲(即雁儿落带过得胜令一首)

普清净之曲(即锦上花二十首) 遍十方之曲(即碧玉箫二十首)

登般若之曲(即折桂令十首)

卷四:

感天人之曲(即小梁州二十首)

庆太平之曲(即叨叨令十一首) 乐和宁之曲(即对玉环十首)

证圆融之曲(即清江引十首) 隆福祚之曲(即上小楼二十六首)

修深性之曲(即万年春二十首) 除爱浊之曲(即南吕一枝花)

显五性之曲(即梁州三首) 悟声闻之曲(即尾声三首)

求尊胜之曲(即斗鹤鹑二首) 修妙门之曲(即紫花儿序二首)

灭宿业之曲(即东原乐二首) 求多闻之曲(即尾声二首)

卷五:

断循环之曲(即集贤宾二首) 违现业之曲(即逍遥乐二首)

心虚明之曲(即双雁儿二首) 纯智慧之曲(即柳叶儿二首)

接法流之曲(即四季花二首) 入圆妙之曲(即望远行二首)

真妙圆之曲(即示骨朵二首) 发真妙之曲(即芙蓉花二首)

信常住之曲(即赏花时二首) 信心住之曲(即醉中天一首)

念心住之曲(即金盏儿二首) 具妙德之曲(即风入松二首)

一精明之曲(即河西六娘子二首) 精进心之曲(即鱼游春水二首)

慧心住之曲(即红叶儿二首) 遍寂湛之曲(即喜春来二首)

凝寂妙之曲(即点绛唇二首) 定心住之曲(即混江龙二首)

定光发之曲(即油葫芦二首) 善悦恻之曲(即天下乐二首)

全十力之曲(即金蕉叶二首) 离过非之曲(即采茶歌四首)

交融摄之曲(即四块玉五首) 无浊漏之曲(即骂玉郎五首)

不妄变之曲(即感皇恩五首) 离过非之曲(即采茶歌五首)

作正观之曲(即花栾树五首) 超密严之曲(即醉高歌五首)

含多义之曲(即相公爱二十五首) 解种业之曲(即咏刹那阿孙二首)

证不退之曲(即兀出千底里曼五首) 聚灌顶之曲(即亦木儿塔哈五首)

传法偈之曲(即也都苦之里迷失五首) 得安隐之曲(即纳木儿塞罕五首)

乐住法之曲(即柏儿荅尔刺思五首) 灭受想之曲(即兀冲格五首)

善利益之曲(即万年欢一首) 无尽行之曲(即玉楼春一首)

具灵相之曲(即蝶恋花一首) 顿觉悟之曲(即千秋岁一首)

具妙德之曲（即风入松一首） 欢喜行之曲（即归朝欢一首）
善现行之曲（即谒金门一首） 不退心之曲（即西江月五首）
回慈光之曲（即临江仙五首）……^①

由这些曲牌而见，其中还有可能是蒙藏曲牌和相应曲调的歌曲。如此丰富，几乎是个明初曲牌库。如果说自明成祖自其皇后去世后即潜心佛曲，至此也算是花了十多年的功夫。而且，明成祖似乎确有做歌的喜好：“二十年五月亲征阿噜台，制平虏三曲，俾将士歌之以自励”，“至二十二年五月复征阿噜台……自制词五章……遂命内侍歌之。”“以述奉天法祖、勤政恤民之意，亦将以垂示子孙，俾有所谨。”^②此可谓歌以咏志。不过，对于永乐朝的宴飨乐舞，清朝人写的《明史》“乐志”则评论为“奏曲肤浅，舞曲益下俚。”^③

但就佛乐而言，像《诸佛世尊菩萨尊者名称歌曲》篇章如此浩繁、曲牌如此丰富的赞佛歌曲集，即便就佛教史上看，也都是极其特别的。

三、明初佛乐与其时佛教政策及信仰倾向的关系

印度佛乐梵呗似乎并没有随着佛经汉译而引入汉地，所谓“金言有译，梵响无授。”^④主要是“梵音重复，汉语单奇，”^⑤难以汉译成曲。不过，由现存古代壁画所描绘的佛乐场面而知，佛乐很早就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而繁荣，且在不同时代乃至不同地域也应有不同的特色。不过，即便佛乐在历代都有流行，但如明初这样由帝王定制佛曲并且以政令推而广之者，仍是比较特别。这一方面反映了明初统治者的佛教认识和信仰倾向，同时，也反映着佛教发展的时代特点以及佛教政策的影响。社会流行的信仰趋势会影响帝王们的佛教态度并会影响佛教政策的出台，而佛教政策进而又会影响到佛教的发展趋向。

1. “敬”、“和”“为治”的礼乐认识

明太祖是位来自社会底层并且出过家当过和尚的皇帝，对于元代教事泛滥对于社会以及佛教的危害十分了解，洪武时期整饬社会秩序的政策便是重头。同时也很重视新朝的礼乐建设及其作用。其有论曰“礼以导敬，乐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为治！”^⑥

虽然孔夫子的时代就认为已经是“礼崩乐坏”了，但中国文化实际仍然延续着注重礼乐的传统。所谓“乐也，人情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⑦而且《乐论》还认为“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饰节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万变。是先王立乐之术也。”^⑧显然，明太祖的乐论，于此意向是一致的。而其敕令为“蒋山广荐佛会”撰著《献佛乐章》，应该也不仅是为了隆重法会，将《献佛乐章》作为礼乐定制之乐，或是一个说明，大致也有使佛乐也能发挥敬和为治作用的希冀。

2. 佛教政策及信仰氛围与明初佛乐

明太祖的“敬”“和”“为治”的礼乐认识，实际上也间接地体现在了明初佛教政策中。

洪武时期推出的佛教政策比较侧重法事及做显密法事教僧的整肃和管理，一方面是有纠正元

①（明）《诸佛世尊菩萨尊者名称歌曲·目录》，《永乐北藏》第179册。

②（清）《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一百四《乐考》。《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

③《明史》卷六十一，《志》三十七《乐》一。

④⑤（梁）慧皎《高僧传》卷十三，《大正藏》第50册。

⑥（明）幻轮《释鉴稽古略续集》卷二，《大正藏》第49册。

⑦⑧《荀子》卷十四“乐论”。

代法事泛滥弊端的考虑，一方面也有统治阶层与民众一样地重视法事的因素。因而，法事活动是明代社会民间乡里“祈禳伸情”的重要宗教活动，更是落实“慎终追远”传统伦理的一种重要方式，以满足世人愿意相信佛道教所谓幽远不测之事以消弭对于不可控命运的心理恐惧的宗教需求，同时也是要通过整饬规范了的佛教法事活动而“导敬”，而隆重的佛乐，相应地增益法事仪式，增强信众的崇敬之情，以“宣和”。在这个意义上，佛教法事活动其实也恰恰是体现宗教维系个体与群体关系基本功能的一种表现方式。明初统治者应该还是比较清楚地认识并利用了佛教的这种宗教基本功能。

为了既防范佛教泛滥又利用来辅助教化，明初有一种将佛教僧伽结构界划为禅、讲、教的政策。元代佛教约定俗成地有禅、教、律之分划，“禅尚虚寂，律严戒行，而教则通经释典”，“各守其业。”^①到明初，禅讲教中的教，则变为专门演行瑜伽显密法事者，即专门做法事的寺僧，用以“演佛利济之法，消一切现造之业，涤死者宿作之愆，以训世人。”^②因为明太祖很重视佛教“阴翊王度”、“暗助王纲”的作用，尤其认为幽远不测的因果报应说可以导人善化，“补治化之不足，”^③所谓“仰僧善道，感化人纯，”“善世利国”。^④

相关政策申明“瑜伽显密法事仪式及诸真言密咒，尽行考较稳当，可为一定之规行于天下诸山寺院，永远遵守。为孝子顺孙慎终追远之道，人民州里之间祈禳伸情之用。”^⑤教僧要严格考试录用，所谓唱念不正，既达不到敬、和的效果，也达不到人天交应的宗教需求。所以要先培训三年，“赴京试验之时，若于今定成规仪式通者，方许为僧。若不省解，读念且生，须容周岁再试。”^⑥

既然法事活动被朝廷正式提倡，法事中不可或缺的佛乐自然也随之流行。虽然朝廷法会上的佛乐有帝王敕令撰写并成为演乐定制，是一般混迹民间的经忏法会上的演乐所不可比的，但佛乐在高层次上被表现和强化，无疑会产生示范效应。明初的明太祖时期的《献佛乐章》、明成祖时期的《诸佛世尊菩萨尊者名称歌曲》，由帝王推出乃至敕为演乐定制，就是最有示范效果的作品，而且对于明代佛乐篇章化的影响也不待言。宗泐曾有《进应制献佛乐章》诗赞扬此事，其诗曰“晓进封函紫殿深，九重斋沐政虚心。翰林拜署延慈曲，乐府翻歌法寿音。清庙烈文同盛大，白云黄竹异荒淫。由来制作当时事，千古揄扬始自今。”^⑦

虽然明初这些佛乐的流传情况不明，但由今天北京智化寺保存的《音乐腔谱》及其演奏、以及云南遗存的与明代宗教音乐有关的资源，仍显示着明代佛乐曾比较丰富的些许痕迹。

其实，明初那些整饬规范法事泛滥目的但实际上重视法事活动的佛教政策，晚出于“蒋山广荐佛会”，但这也恰恰可见明初统治阶层对于佛教法事的社会作用的认识是一贯的，也是社会一般佛教认识和信仰倾向的反映，同时，这些也正是明代佛乐流行的促因和社会环境。

(责任编辑: 李建欣)

① 《元史》卷二百二《释老》。

② (明) 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二，《中国佛寺志》4，台湾：明文书局，1980年。

③ (明) 宋濂《重刻护法论题辞》，《宋文宪公全集》卷十三。

④⑤⑥ (明) 幻轮《释氏稽古略续集》卷二，《大正藏》第四十九卷。

⑦ (明) 宗泐《全室外集》卷六，《四库全书》集部。